

共享繁荣研究进展*

贺立龙 曹梓渲 李雯欣

摘要:共享繁荣指各国最贫穷的40%人口有平等机会参与经济建设并分享足够的成果。共享繁荣不是存量财富再分配,而是财富增长与共享,它不拘囿于消除绝对或相对贫困,而旨在提升中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地位。对共享繁荣的研究,致力于构建可识别中低收入或脆弱群体从增长中获利程度的标准,一般用收入或消费指标衡量。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共享繁荣提供支撑和动能,前者强调经济增长和机会公平兼容,表现为中低收入人口或脆弱群体收入和消费的更快提升;后者关注增长与共享可持续性,强调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冲突等多重风险挑战,保证共享繁荣的稳步推进。各国通往共享繁荣之路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合理的规则、制度以及适宜的战略、政策。对共享繁荣研究进展的梳理与展望,可为中国共同富裕理论探索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关键词:共享繁荣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发展

一、共享繁荣的提出与含义

繁荣作为可持续增长和财富累积的结果,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但繁荣之果不一定自动共享。为比较不同群体在增长中的获益程度,Lakner & Milanovac(2016)提出了全球增长发生曲线(global growth incidence curves),即所谓的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曲线显示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增长呈现群体分化特征:位列75%~90%收入分位的群体及底层群体收入增长最慢,中位数群体及前1%分位群体收入增长最快。Piketty(2014)研究表明,随着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放缓,由于资本收益率(r)高于经济增长率(g),增长成果更多流向富裕群体而导致财富分化和不平等加剧。面对增长及繁荣的失衡,世界银行2013年提出“消除贫困”(ending poverty)和“共享繁荣”(shared prosperity)两大目标,即在2030年将极端贫困人口降至全球人口的3%,同时提升在收入分组中处于底层40%的那部分人口(bottom 40 percent household income group)的平均收入。与人均GDP等经济增长衡量方式不同,共享繁荣追踪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过去假设,增长的国民收入会慢慢流向穷人——但情况并非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增长不错的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了,不平等因此加剧,而共享繁荣关注的正是那些不太富裕的人是否获得了理想的增长(World Bank, 2013a)。共享繁荣的提出表明,增长成果应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底层人口,以实现增长包容与社会公平,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asu(2013)所言,共享繁荣旨在促进增长与平等耦合,形成对减贫目标的补充。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进一步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两方面阐释了共享繁荣的关键维度与实现路径。共享繁荣引发学界关注,诸多学者使用shared prosperity、prosperity for all、sharing prosperity等概念对其进行了探讨和测度。

共享繁荣并非世界银行最先关注的新领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Chenery et al(1974)就探讨了

* 贺立龙,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5,电子邮箱:helilong2002@163.com;曹梓渲,四川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邮政编码:610065,电子邮箱:e65617535@qq.com;李雯欣,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0065,电子邮箱:571833709@qq.com。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风险冲击视角下规模性返贫的预警、阻断与长效治理研究”(21BJL060)。高行、李瑞琪、李静超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不同群体收入的理想增长率,特别提及最贫穷的40%人口,而这一群体的收入增长正是后来世界银行用以刻画共享繁荣的指标。共享繁荣作为一种理念的提出可追溯到Kozmetsky(1997)关于国内外共享繁荣的论述,即发展中国家在内部跨部门之间和外部类似地区之间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融的共享发展网络。这一理念不是简单的涓滴经济学,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等跨学科的发展思想探索,它涉及产业集群和社会资本的和谐构建,涵盖从教育和劳动力培训到收入公平、政治稳定、技术转让和国际贸易等在内的诸多内容,并关注到网络通信技术对共享繁荣的重要性,从而构成共享繁荣的知识和理论基础(Phillips, 2005)。

世界银行以繁荣定义增长或发展成果的持续累积,将共享释义为底层40%人口参与该国经济建设并从中获利的程度。共享繁荣的本质是中低收入人口或脆弱群体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并分享繁荣之果(World Bank, 2015),一般用最贫穷40%人口的家庭人均收入或消费的年化增长率来度量(World Bank, 2020b)。共享繁荣概念及目标的提出旨在引起人们对分配问题的重视,强调良性的发展应惠及贫困群体。而国际社会对共享繁荣的关注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国家正在探索如何持续地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阶层(World Bank, 2013a)。共享繁荣以增长为基础但更关注共享,即穷人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分享增长成果的程度,并将共享视为政策制定的关键目标和标准。从实践来看,总体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并不能精准地指代最富有或最贫穷两个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总体的平均忽略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掩盖了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分配不平等和增长非包容问题(World Bank, 2015)。此外,气候变化、政治不稳定和地区冲突、金融风险与经济震荡等多重挑战对共享繁荣可持续推进的威胁与阻碍亦不容忽视。因此,共享繁荣目标也暗含了对气候应对、生态改善、和平善治以及经济金融稳定等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内在要求。共享繁荣的研究对象是一国或地区底层40%人口,锁定该目标群体的方法是选择一条与全国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40%阈值对应的划分线。关于共享繁荣目标群体占底层40%人口份额的设定,学界进行过讨论。若份额设置过高,贫困人口的真实情况会被中高收入群体“平均化”;若份额设置过低,中等收入偏下人口会被忽视,且容易受困于极端贫困人口收支数据搜集及计量的误差问题。Palma(2011)在关于国家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性研究中发现:收入最高的10%与最低的40%人口的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处于中间的50%到90%的人口收入差距大致不变,这为把40%作为分界点提供了逻辑和实证依据。

共享繁荣要求尽快增加不太富裕人群的福利,但并非主张重新分配一定规模的经济蛋糕,或从富人那里拿走并给予穷人。共享繁荣融合了增长和公平概念,如果一个国家扩大蛋糕规模,同时以提高其底层40%人口收入的方式分享蛋糕,那么它正在走向共享繁荣。增长和公平的权衡可能只是短期问题,从长期来看,提高底层40%人口生产能力的再分配政策提高了经济的整体增长潜力(World Bank, 2014)。之所以不使用底层40%人口的增长率与平均增长率相对比值作为共享繁荣目标或指标的原因是,即使不平等有所加剧,但只要在发展过程中穷人收入能快速增长,也不失为一个次优结果。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不平等在社会和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一个国家在高的不平等程度下能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状态,这是因为,不平等持续加剧(或陷入高度不平等)将限制不太富裕人群的收入增长,最终限制增长本身(World Bank, 2013a)。近年来,世界银行还提出了共享繁荣溢价(shared prosperity premium)的概念,反映底层40%人口与总体人口在收入或消费年化增长率上的差异,若溢价为正则表示底层40%人口的收入占经济体总收入的份额在增加,共享繁荣溢价和共享繁荣一起成为衡量国家包容性增长和民生福祉增进的重要指标(World Bank, 2020a)。

在理解和度量共享繁荣时,一个易混淆的概念(指标)是相对贫困(线)。共享繁荣与相对贫困都是借助一国居民收入(或人口分组)的某种比例划线来识别目标群体,在监测追踪过程中这类识别线保持不变,而线内对象则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都具有宏观静态和微观动态双重属性。但二者在概念内涵、治理目标、测度方法等方面存在区别。美国学者Fuchs(1967)基于相对收入提出相对贫困的概念,将目标群体指向低于一国居民收入中位数一半以下的家庭,其本质上是贫困和社会结构性问题。相对贫困聚焦于由不平等和权利剥夺导致的社会不公及个人发展困境,在治理中旨在推动贫困个体在摆脱绝对贫困后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减少收入差距和不平等;而共享繁荣聚焦

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旨在保证中低收入人口能参与经济建设与分享,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World Bank, 2015)。相对贫困定义和衡量较繁杂,其范式与方法随区域差异及社会转型发展而变化,未形成统一标准,在各个国际机构或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识别线,如世界银行采取平均收入 1/3 线,欧盟采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60% 线;而共享繁荣采取简明统一的指标与方法,将收入分组的底层 40% 人口作为全球统一的识别线,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二、共享繁荣的衡量与监测研究

对共享繁荣的衡量就是对底层 40% 人口参与经济建设并从“蛋糕”中分得利益的衡量。各国追踪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往往与国民收入监测一起进行——从中识别出底层 40% 人口并观测其收入变化(World Bank, 2013a)。各国为监测和评估不同时期居民收入或消费的增长,先进行家庭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并建立数据库,再通过指标方程进行数据分析。为保障数据质量和评估的真实可靠性,需制定考虑国情和区域差异的定制化问卷清单,保持调查的连续性、高频性。

(一) 共享繁荣的衡量

1. 对象瞄准。评估共享繁荣的关键是建立一个衡量个体从增长中获利的标准。对这类标准的探讨可追溯到 1971 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 Robert McNamara 提出的关注底层 40% 人口并为其制定支持政策的倡议——因为该群体生活水平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穷人在发展中的获利程度问题进入经济学家视野。Rawls 在《正义论》(1971)中提出,促进人口中最不幸成员的福祉应是一个优先事项。1974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再分配与增长》报告引起学界对贫困人口分享多少增长成果及其如何衡量的关注。Chenery et al(1974)主张通过观察贫困者收入增长探讨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收入被视为福利的主要衡量指标。此后,世界银行提出的千禧年发展目标(MDGs)引发学界对“谁该从增长中受益”的讨论。一个共识逐渐形成:穷人应从增长中获得足够比例的好处或“理想”的收入增长率(Kakwani & Pernia, 2000; Essama-Nssah & Lambert, 2009),衡量共享繁荣应以确保增长中的贫困群体福祉增进为关键目标。

共享繁荣目标群体的识别与划分标准源于 Basu 提出的五分位收入概念,在五分位收入各群体中,重点是最贫困 20% 人口的收入增长率(Basu, 2006),该标准具有与人均收入等宏观福利指标不同的实用主义特征(Basu, 2000)。一些学者提出平等主义增长理念,要求 GDP 至少 40% 的比例归属于底层 40% 人口,但现实中很难实现(Subramanian, 2011)。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关注收入分位的底层两个五分之一(即底层 40%)更为合适。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极端贫困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 20%,该群体缺乏稳定或正规收入来源,若选择这部分人口评估共享繁荣,容易出现计量误差。加之,有学者在对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研究中发现,按收入排序,最高 10% 人口与底层 40% 人口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Palma, 2011)。因此,40% 成为潜在的更为适宜的中低收入分界线。

综上所述,确保弱势群体福祉是推进共享繁荣的关键目标,而底层 40% 人口的标准有助于瞄准上述目标。聚焦底层 40% 人口这一目标对象,不仅便于识别,而且基于此标准的衡量也满足福利函数标准公理规范的匿名性特征和弱帕累托原则。一方面,共享繁荣衡量可能涉及多种可替代的生活标准指标,但不会局限于跟踪调查群体中的个人,因为处于这 40% 的个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共享繁荣指标也满足福利函数的弱帕累托原则,即“如果一个群体中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这个群体就被认为更富裕了”。因为共享繁荣跟踪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其收入增长意味着这部分人口福祉的改善。同时,共享繁荣还是福利函数研究的一个特例。与福利函数收入水平和福利权重分配成负相关的模型不同,共享繁荣对福利权重的分配仅放置在底层 40% 人口上,对这一比例之上的群体福利权重分配为零,形成一个分段函数。

2. 指标选取。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 Sen(1985, 1999)为代表的学者将发展与福祉的讨论由货币收入拓展到包含可行能力、权利等在内的多维内涵。Roemer(1998)讨论了机会公平概念,将个人起点条件和资源的分配同福祉共享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开始以反映生活水平的非货币性指标衡量发展和人的福祉,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与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

中心共同提出多维贫困指数,世界银行提出人类机会指数等(World Bank, 2015)。Stiglitz et al (2009)从全面评估经济活动、生活质量和福祉,关注机会平等,重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容纳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测量框架,监测评估共享繁荣进展。Alkire & Foster(2011)以教育、健康、生活条件为主要维度,构建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为人类减贫与共享繁荣的多维度量提供了方法基础。从基准指标看,除收入这种常用的福利指标之外,还有学者强调消费的重要性(Deaton, 1997; Deaton & Zaidi, 2002)。Deaton(1997)认为,根据持久收入假说,消费比收入更适合用来衡量生活水平,其受计量误差和波动的影响较少,并能反映家庭可用资金流入、储蓄或借贷能力。World Bank(2015)指出,一个完美指标是不存在的,收入和消费作为个体从增长中获利的常用衡量标准成为测度共享繁荣的主要指标。

(二)数据获取

1. 家庭问卷调查法。家庭调查能全面详尽地呈现不同阶层个体收入和消费的分类信息。在共享繁荣评估中,可根据家庭收入和消费类目,设计问题清单来获取各国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数据,但调查对象差异以及时间间隔的敏感性会导致数据结果的异质性,设计不当会影响评估结果的真实可靠性。Deaton & Kozel(2005)研究发现,调查涉及的时间跨度长短不同会带来异质性的数据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对消费或收入事项的记忆受时间影响而产生差异。Beegle et al(2012)在坦桑尼亚进行问卷设计实验时发现,缩短询问清单和延长回忆期会导致调查结果低于真实消费水平。为统一标准,他们提出了一个列举食物长清单和 7 天回忆期结合的调查方法,被认为是黄金准则而得到推广。此外,调查培训、监督和数据输入环节的问题会影响数据质量,而实施时机和周期会影响数据的可比性。比如,调查实施的季节会影响调查的阶段性结果,世界上 80% 的贫困者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农业活动为生,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季节性影响(Khandker & Mahmud, 2012),而数据在每个季度的差异性都具有代表性(D'Souza & Jolliffe, 2012)。这种季度调查可作为年度调查子样本来解释指标波动,但会对共享繁荣数据收集的持续性和高频性提出更高要求。2015 年世界银行承诺支持国际开发协会中的 78 个国家在 2016—2030 年间每三年收集一次估计共享繁荣所需的多主题调查数据,即在 15 年里进行 390 次调查。Kilic et al(2017)评估了这类家庭调查的成效与成本,认为调查所得多主题数据可以反映出减贫和共享繁荣双目标的进展、贫困家庭及个体福利状况,以及这种福利与其他经济成果和政策的联系。

2. 数据库的建立与扩充。衡量共享繁荣进展要对不同时间节点的指标增长情况进行调查,其仅靠一次数据搜集无法完成,因而数据库的建立和扩充成为关键。世界银行的 PovcalNet 数据库是衡量全球共享繁荣进展的信息基础,其早在 2015 年就获得来自全球各地的 1000 多份关于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数据系列(World Bank, 2015)。截至 2020 年 9 月, PovcalNet 数据库覆盖了 166 个经济体,但只在部分经济体上拥有可全面度量共享繁荣的指标数据,大部分经济体仍缺乏足够的可比较、追踪的数据系列。为更广泛而充分地衡量和监测各国共享繁荣状况,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和提升共享繁荣数据收集的规模和质量。近些年来,一些国家陆续建立或完善了相关数据库来进行这项评估,较为知名的国别数据库有美国的收入动态面板(PSID)、越南的家庭生活标准调查(VHLSSs),以及印度的基于国家抽样调查(NSS)横截面搭建的合成面板等(Dang & Lanjouw, 2015)。

国家、地区层面的可比性是全球共享繁荣数据库建设与遴选的参照标准。家庭数据采集方法的差异会导致各国在数据搜集和监测评估上缺乏共识或可比性,影响评估可靠性与可信度(Carletto et al, 2013),不利于全球范围的研究参照与政策评估。对此,有国际组织和学者提出了方法标准化、流程规范化等增加可比性的提议(Fiedler et al, 2013)。这种异质性或差异性的存在提醒研究者应考虑到国情差异,对不同国家做出定制化的问卷调查设计。比如,一份针对中等收入国家食物消费的问卷若用于极端贫困高发的国家,则不能反映真实消费水平(World Bank, 2015),更不能用于国家间比较。因为贫困国家很难接触到清单上丰富的食物种类,数据结果将低于真实水平。相反,根据当地情况定制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如调查当地住户对本地地产物的消费,有助于更真实反映收入与消费情况。相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时还应考虑区域间物价及生活成本差异,避免形成帮扶对象选择偏

差(DeNavas-Walt et al, 2013)。Jolliffe(2006)基于美国政府住房计划的数据研究发现,在考虑住房成本差异之后,非都市贫困率低于都市贫困率。来自埃及的数据同样反映了这一问题,考虑生活成本的空间差异,城市地区贫困率增长了一倍,与非城市地区贫困率大致持平(Jolliffe et al, 2004)。因此,在衡量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时,应考虑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生活成本和物价差异,从而针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底层 40% 人口制定精准有效的福利帮扶政策。

(三) 共享繁荣的监测

1. 监测方法。监测共享繁荣可通过比较底层 40% 人口两个时期的收入或消费增长变化来进行,收入或消费的提高意味着共享繁荣的推进。首先要锁定底层 40% 人口群体,可设定一条与全国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 40% 对应的临界线来识别,具体标准与指标选择则取决于各国可用的数据。例如,世界银行开发了用以监测各国贫困情况的在线工具 PovcalNet,其提供了城乡人口分组数据,可据以设定与全国最低 40% 消费水平对应的临界线,以确定底层 40% 的监测样本(World Bank, 2020a)。

锁定目标群体之后,需要根据共享繁荣定义构建指标方程,对监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将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作为直接的监测指标,而这一指标的增长可被具体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总体(调查平均值)收入(或消费)的增长;二是底层 40% 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World Bank, 2015)。共享繁荣以底层 40% 人口为对象的定义及比例设置一定程度上源于 Basu(2000)五分位收入的概念,对共享繁荣监测指标体系的探索也以这一概念为基础。基于此,Rosenblatt & McGavock(2013)建构指标方程过程如下:

一个有 n 人的国家的收入状况可写成非负数向量 $x = (x_1, x_2, \dots, x_n)$,其中向量的脚标代表对应第 i 个人的收入。假设向量 x 的脚标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排列为 $x_1 \leq x_2 \leq \dots \leq x_n$,数字 n 为该国总人口,选取两个五分之一(即底层 40%)为 r ,并将 r 定义为 $r/n \leq 0.4$ 的最大整数,则衡量共享繁荣指标 x 的方程可写成:

$$SP(x) = [x_1 + x_2 + \dots + x_r] / r$$

假设“整数问题”不存在,那么 $r = 0.4 \cdot n$ 。设 $s(x)$ 表示在收入状况 x 中,最底层 40% 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将 $s(x)$ 和 r 代入 $SP(x)$,并令 $y(x)$ 表示国家总人口人均收入来简化方程,则:

$$SP(x) = \left(\frac{s(x)}{0.4} \right) \cdot y(x)$$

比较 $SP(x)$ 在 t 和 $t+1$ 两个时间节点的百分比变化,将 $s(x)$ 缩写为 s ,并简化为百分比的标准写法,则:

$$\widehat{SP} = \frac{[s_{t+1} \cdot y_{t+1}]}{[s_t \cdot y_t]} - 1$$

令上述方程等于零,可得到一条刻画“扩大蛋糕”(y_{t+1}/y_t)和“分享蛋糕”(s_{t+1}/s_t)关系的曲线。若人均收入比和共享比都大于 1,则收入增长效应和共享效应均为正,共享繁荣不断增进。若两者比率都小于 1,共享繁荣会下降。不过,也可能出现收入增长与共享呈相反方向发展的情况,这取决于一个比率是否大于另一个比率。在多数情况下,相比于共享,增长对促进共享繁荣发挥的作用更大(Rosenblatt & McGavock, 2013),为推进共享繁荣,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需达到一个不低于甚至高于整体增速的理想增速(World Bank, 2016)。

2. 动态追踪。世界银行建设了全球共享繁荣数据库(GDSP),用于跟踪和预测共享繁荣的进程和趋势,该数据库于每年 4 月和 10 月进行更新。截至 2020 年第七版 GDSP 已有 78 个经济体的共享繁荣追踪数据(World Bank, 2020a)。有学者指出,共享繁荣的监测追踪总是固定在底层 40% 这一特定比例的收入增长变化,可能忽略穷人和脆弱群体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为此,Dang & Lanjouw(2015)提出一种有效跟踪共享繁荣变化的方法,它借助脆弱线来构建度量共享繁荣的脆弱性指数。

具体而言,让 y_t 和 Z_t 分别代表家庭在时间 t 的消费和贫困线, $t=0$ 和 1;把 V_0 定义为脆弱线。在 0 时

期消费水平高于贫困线但仍低于脆弱线的特定比例的人口,若在 1 时期将低于贫困线 Z_1 ,则将这部分人口在 1 时期重新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称为“脆弱性”指数。指数值越低意味着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比例越低。新的脆弱性线可定义为:在给定的脆弱性指数 P 的情况下,满足以下条件的脆弱性线。

$$P = P(y_1 \leq Z_1 \mid Z_0 \leq y_0 \leq V_0)$$

也即:

$$P = \frac{P(y_1 \leq Z_1 \cap Z_0 \leq y_0 \leq V_0)}{P(Z_0 \leq y_0 \leq V_0)}$$

脆弱性线同贫困线类似,可根据一个基准来构建。但脆弱性线旨在跟踪面临贫困风险的个体,又与具有宏观静态属性的贫困线有所不同。基于脆弱性线的动态监测方法有助于观察共享繁荣总体进程中的个体返贫风险。此外,Milanovic(2016)引入了“全球中位数收入比较法”进行全球共享繁荣监测,该方法致力于跟踪个体收入中位数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了解不同人群在全球化中经历的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为共享繁荣动态监测提供了全球视角。

三、共享繁荣的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共享繁荣的因素可被理解为影响底层 40%人口收入和消费的因素。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共享繁荣的两大基石。包容性增长意味着贫困或边缘群体收入和消费的增长(World Bank, 20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贫困者收入相对于总的人口收入更快的增长,它致力于增长与机会公平兼顾,推动贫困群体参与经济发展以增加收入(Berg & Ostry, 2011)。就业、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安全网都是包容性增长的考量因素(Ali & Son, 2007)。气候变化、冲突以及金融风险与经济震荡带来的可持续发展阻滞对共享繁荣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一)包容性增长与共享繁荣

包容性增长是共享繁荣的基础。共享繁荣包含增长和公平两个关键要素,它致力于促进底层 40%人口的收入增长(World Bank, 2013a)。包容性增长首先是增长,没有增长便无法繁荣,更不能使穷人生活水平提高。但增长本身是不够的,共享繁荣要求增长须包容不太富裕的人群,这种包容性表现为机会公平、经济平等以及增长均衡、分配合理。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两大内核,增长与公平成为共享繁荣的双重支撑(Narayan et al, 2013; Bussolo & Lopez-Calva, 2014; World Bank, 2018)。具体来看,宏观增长、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因素决定“繁荣”,而分配调节以及社会公平政策影响“共享”。增长与包容并非天然对立,而是存在内在关联或相容性。World Bank (2016)指出,促进包容性和机会平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实现包容性增长,特别是生产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将为共享繁荣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1. 经济增长因素对共享繁荣的影响。增长是推进共享繁荣的物质前提。社会整体收入的提高被视为共享繁荣的必要条件(Dollar et al, 2013)。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推动经济多元化能有效改善公众生活水平。

(1)宏观增长、经济政策与共享繁荣。根据涓滴效应理论,宏观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经济建设成果惠及各个行业群体,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共享繁荣自动推进。Dollar et al(2013)研究证实,总体收入增长和底层 40%收入增长有正向关联性。World Bank(2015)研究发现,泰国各省的总体消费增长率与底层 40%人口消费增长率正相关,不平等与底层 40%人口消费增长率负相关。以增长驱动共享繁荣离不开宏观和微观政策的共同作用。Crivelli et al(2010)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从多个方面影响共享繁荣进程。涉及集体谈判、最低工资、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政策合理运用对共享繁荣有直接的正向推动(Marshall, 2012)。Othman(2015)研究发现,小额信贷政策在促进包容性增长、减少不平等、加速减贫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2)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共享繁荣。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与技术转让为人们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Balistreri et al(2016)构建了评估贸易成本对共享繁荣影响的 CGE 微观模型,发现

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成本降低增加了最贫穷40%人口收入份额。同时,区域一体化为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提供机遇。Ahmed(2013)以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为例,研究发现深化贸易一体化可以创造增长与就业机会,促进地区包容性增长。Nyo(2015)研究了缅甸加入东盟对其共享繁荣的影响,发现一体化增加了投资、贸易合作机会,推动更多人参与经济活动;在共同体内部竞争中,提高本国劳动力技能、完善正规教育系统,改善电力、道路和信息通信技术对共享繁荣至关重要。Balistreri et al(2016)对6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一体化推动了不同地区与群体的发展融合,在融入三方自由贸易协定后,底层40%人口的收入明显增加。Ofori et al(2022)关注到一体化和资源配置对促进共享繁荣的联合效应,利用1980—2019年间4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验证了一体化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财政政策配合下这种作用更显著。

(3)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共享繁荣。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因素(Ofori et al,2022)。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扩展甚至创建一个投资市场,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McLeod,2014; Ofori et al,2022)。McLeod(2014)基于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创造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可以推动当地快速、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基建繁荣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关键是协同推进“硬基础设施”(道路、港口、电力等)、“软基础设施”(银行、货币、金融管理等)和“湿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建设,从而产生“繁荣的加倍”和创造惠及更多人的“蛋糕”。近些年来亚洲开发银行及其合作伙伴国秉持基建繁荣理念,通过一体化经济走廊建设推动了湄公河地区经济的包容性增长。Sondergaard et al(2016)研究指出,泰国通过加大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全面强化与邻国的贸易、物流、投资和旅游一体化联系,不仅在项目建设期间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借助区域交通设施的建成和完善,推动了人口跨区域流动,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地域包容性,促进了更多新就业机会的产生。此外,新型基建助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共享繁荣推进的作用日益凸显。有学者关注信息通信技术(ICT)扩散对一体化和包容性增长的影响,Ofori et al(2022)指出,随着非洲自贸区数字基建的推进,未来可观察到信息通信技术扩散对这一地区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繁荣的影响。

2. 机会公平因素对共享繁荣的影响。增长不是共享繁荣的充分条件。增长无法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实现共享繁荣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之上(World Bank,2016)。Basu(2013)指出,增长为部分群体提供了机遇,但可能导致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放大,由此带来的动荡、犯罪、健康受损、家庭生计波动均会侵蚀共享繁荣。由于初始分配不平等或机会不公,底层人口以及边缘弱势群体拥有更少资源,缺乏教育、技能和资本积累能力,获得高薪职业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小,很难同步实现社会平均的收入增长、地位提升。Ferreira et al(2014)使用118个家庭调查和134个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检验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发现,由出生环境带来的机会不平等对此后的收入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初始分配及机会不平等制约收入增长。采取包容性帮扶政策是提高底层40%人口收入的关键,在增长乏力时减少不平等对维系共享繁荣至关重要(World Bank,2016)。

就业不平等和劳动报酬差距过大构成收入公平与共享繁荣的结构性制约。Appleton et al(2014)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工资结构失衡,其中,性别、教育、健康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工资分配不均,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1)性别。为女性提供公平就业机会、缩小男女收入差距,在分享与增长两方面均有助于共享繁荣。Kennedy et al(2017)研究工资性别差距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减少10%的收入差距可使人均产出提高3%。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近50%的女性生产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男性这一比例仅为22%,贫困地区女性面临的制约因素比男性面临的更为复杂。对此,国际社会呼吁在教育、技能培训、金融、现代技术运用方面给予包容性政策支持,提升女性发展能力,促进女性平等就业。世界银行发布的《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性别平等与发展》提出,通过生活技能培训、性教育与生殖健康教育普及、有条件转移支付方面的政策指导,消除女性就业的结构性障碍,可显著增进女性参与经济发展的能力,提高女性收入(World Bank,2011)。世界银行以及一些学者还强调发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在提升女性话语权、增加女性学习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World Bank,2011;Klugman et al,2014)。Othman(2015)研究发现,小额信贷可显著提升马来西亚妇女的创业参与度。

(2)健康。居民或劳动者保持良好的生命健康状态,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者就业两方面可助益增长与机会公平。欠发达地区通常是卫生条件差、疾病高发的地带,医疗卫生系统能力有限,一旦遭遇公共卫生事件或疾病肆虐,就可能引起当地劳动者身体健康受损,失去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构成对共享繁荣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在“热带病”高发地区推广常见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综合治疗的方法,在制药企业、国际发展机构、私人基金会以及政府机构协作下,定期提供较大规模的医疗援助和药物捐赠,帮助消灭了沙眼、淋巴丝虫病,极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全民健康和共享繁荣(Engels, 2017)。Tambo(2019)观察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跨国公共卫生治理、疾病治疗、健康信息管理与共享的水平,缩减各国医疗卫生系统间的差距,由“一带一路”带动的亚非欧国家公共卫生合作为伙伴国带来全民健康建设的机遇,推进了当地共享繁荣进程。传染病大流行导致的规模性健康侵蚀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共享繁荣事业。新冠疫情形成的劳动力健康损害、就业退出及“疤痕效应”使共享繁荣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全球40%的边缘群体生活在返贫风险威胁下,到2030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2/3(World Bank, 2020b)。各国亟须协同推进医疗卫生系统建设,增加健康韧性和风险应对能力,保障全球共享繁荣推进。

(3)教育。教育关系到社会赋权、收入平等和共享繁荣(Appleton et al, 2014)。人力资本、生产效率以及经济回报提升的关键是教育(Bassanini & Scarpetta, 2013)。Roemer & Trannoy(2015)指出,个人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由其家庭教育成就和收入决定,即收入机会不平等在出生时便存在。World Bank(2013b)使用人类机会指数(HOI)衡量儿童个体禀赋及发展机会的差异,发现接受教育的权利或机会在不同国家、区域之间存在差异,造成儿童在未来就业与收入上的差异,对全球共享繁荣推进造成深远的影响。Molina et al(2015)指出,劳动者缺乏良好的教育或培训,将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和收入受限。就业市场上的“技能偏见”使得未接受教育的人更易陷入持久贫困,收入增长最快的工作所要求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日益提高,而生活在底层的人很难接触到这种技能及学习机会。尽管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接受线下教育不足的人借助网络获得了在线学习机会,但在线教育的参与门槛也在提升,可能导致更大的知识鸿沟和教育不平等。对此,Hargreaves(2021)呼吁,政府和相关机构应重视公共教育,缩小数字鸿沟,在弱势群体教育获得和未来发展上提供更多的包容性机会。

3. 与包容性增长有关的金融、科技因素对共享繁荣的影响。包容性增长除了通过更具普惠性的产业发展或就业增收直接促进共享繁荣之外,还从金融包容性、科技包容性乃至数据包容性、文化包容性等多维层面影响共享繁荣的实现。特别是,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运行和财富创造分配,在极大地助益共享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潜在的风险。

(1)金融包容与共享繁荣。金融危机、经济震荡带来高失业率和社会不稳定,使劳动者陷入贫困和不安感,对共享繁荣造成负面冲击甚至终结险象(Whalen, 1997)。Gould et al(2016)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深度、效率、稳定性和包容性)对总人口收入和底层40%人群收入的影响发现,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包容性对共享繁荣起到最为关键的影响,其次是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金融体系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收入增长更快,而企业和个人层面的金融包容性将使得国家层面的收入增长更具包容性,并有助于底层40%的人分享这种收入增长。Coulibaly & Yogo(2020)强调金融包容对降低银行脆弱性的作用,指出金融包容不仅帮助企业和个人正常时期抓住更多经济机会,还能在金融危机期间帮助脆弱群体和底层劳动者获得一定的金融保障,缓解金融风险冲击对共享繁荣的负面影响。

(2)数字化、人工智能与共享繁荣。数字化对共享繁荣具有双向影响。一方面,数字化在生产活动中取代人力、提高效率,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或代价,如岗位缩减、失业率升高和收入差距扩大。Berube et al(2018)指出,高薪职位对数字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低技能工人面临就业受限和工资下调的威胁。Autor(2015)考察发现,美国的自动化趋势导致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一些常规的中等收入的工作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处于技能阶梯顶端的群体受益匪浅。另一方面,数字化创造新行业与新岗位,为底层40%人口带来就业增收新机遇。数字化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平台经济促进就业。Alyakoob & Rahman(2022)研究发现,家庭共享平台 Airbnb 对纽约当地餐馆就业

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Airbnb 活动强度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餐厅就业增长约 1.7%。一本题为《人工智能与共享繁荣》(Klinova & Korinek, 2021)的报告探讨了 AI 开发人员、用户、政策制定者、劳工组织和工人如何共同引导 AI 发展,以实现成果共享,提出了以人工智能创造更多就业的两个方向:一是关注额外劳动力需求的激发,寻找人工智能促进生产效率提升和社会富裕的途径;二是从伦理道德出发,推动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警惕人工智能在减少就业机会、提升技能门槛上引发的不平等困境,引导人工智能向共享繁荣方向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与共享繁荣

共享繁荣要用可持续方式实现,以确保地球的未来,减轻子孙后代负担。没有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无法保证底层 40%的人口生活稳定和福祉持续增进(World Bank, 2013a, 2014)。生态退化、气候变化,冲突等风险对共享繁荣构成阻断或迟滞意义上的挑战(World Bank, 2011)。

1. 气候变化、资源利用与共享繁荣。适应气候变化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共享繁荣持续推进的先决条件。World Bank(2013b)指出,气候变化对全球共享繁荣构成严重威胁。一方面,极端天气及由此引发的人口迁徙和卫生问题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World Bank, 2020b)。Mariotti et al(2018)调查指出,非洲马拉维地区长期遭受干旱和洪水侵袭,1/3 的马拉维人几乎完全依赖人道主义救援维持生存。另一方面,以自然资源出口为支柱的发展模式脆弱性凸显,造成国家或区域的规模性返贫风险,阻断共享繁荣进程。McLeod(2014)研究指出,印度尼西亚要摆脱国家脆弱性,走向共享繁荣,必须从“不健康”的资源出口依赖道路中走出来,推动贸易向出口制成品方向转型。有学者提出“共享可持续的全球繁荣”(sharing a sustainable global prosperity)概念,主张着眼于贸易、投资和环保等目标整合,将国际组织和政府“至上而下”的管理约束与全球各地“至下而上”的模式探索结合,开发政策工具,找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共享繁荣的最优战略与策略(Bacchus, 2018)。

2. 地缘政治脆弱性与共享繁荣。稳定的地缘政治是共享繁荣持续推进的政治保障(Bussolo & Lopez-Calva, 2014),地缘政治脆弱性和社会不稳定性带来的暴力、冲突会打断共享繁荣的有序推进(Mayar, 2018)。当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尤其是冲突加剧时,国家战略重心便不再是经济建设,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就业机会缩减,使共享繁荣遭受重大挫折。Sondergaard et al(2016)研究指出,宪法短暂、军事政变频繁等政治不稳定性因素制约泰国未来增长和收入分享的前景,构成共享繁荣的重大挑战。Dang & Lanjouw(2015)对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过去十五年来经济增长与共享繁荣推进状况进行分析指出,共享繁荣的实现应兼顾各个领域的发展,考虑就业、投资、创新和社会转移支付等因素,但社会稳定是以上因素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应对社会不稳定性及其负面影响,有学者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比如通过完善就业保护法以缓解就业不稳定性(Bacchus, 2018)。然而,一旦遭遇不可控的多边暴力冲突或战争,立法对脆弱性群体的保护将失去效力,解决冲突、恢复和平成为紧迫之策。地缘政治不稳定性成为全球可持续实现共享繁荣的严重挑战,暴力、冲突蔓延阻滞共享繁荣进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这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和平,以保护人类共享繁荣成果免遭巨大破坏(McLeod, 2014)。Fox & Mubarak(2017)提出“移动社会制造”概念,主张在冲突地区设置移动式工厂以维持必需品生产和保障就业,这在阿富汗、乌干达以及索马里地区都得到初步应用。

3. 多重风险冲击叠加与共享繁荣。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走向共享繁荣进程中可能同时遭遇来自经济、政治与自然的挑战,导致穷人面临多重风险。世界银行发布《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 2020》指出,全球 40%以上的穷人生活在受冲突和暴力影响的经济体,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 2/3,同一时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导致约 6500 万至 1.29 亿人陷入贫困。全球约有 1.32 亿穷人生活在洪水风险高发的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生活在既受冲突影响又面临高洪水风险地区(World Bank, 2020b)。在疫情致使全球减贫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气候冲击加上世界最大粮食生产国之间的冲突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阻碍了经济复苏和共享繁荣进程(World Bank, 2022)。地缘政治不稳定与冲突、气候变化以及重大流行病的叠加冲击,严重威胁着脆弱经济体和人口的发展减贫进程,给全球共享繁荣带来复杂严峻的挑战。

四、实现共享繁荣的制度和政策研究

一个国家如何实现共享繁荣? Antoine et al(2017)研究了117个国家(地区)1967—2011年间底层40%人口收入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对人力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不仅有助于整体增长,也推动了贫困人口收入更快增长。但除了推进增长,决策者还要借助一系列工具调整增长的利益分配以惠及底层家庭。World Bank(2013a)提出,通往共享繁荣之路是多元而又相辅相成的,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应承担各自责任。第一,增长为所有阶层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民营部门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政府也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实施营造有利环境以保持高投资率的政策和法规,投资于现代劳动力所必备技能的提升。第二,国家构建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契约”,为所有公民提供发展机会,如普及幼儿发展、健康、营养、教育等基础知识,消除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障碍,创建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免受剥夺和冲击的安全网,为增长和公平提供激励性税收制度。各个国家都有不同历史和需求,没有一个普适方案。拥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坚实的制度基础以及强大的政治意愿,让所有公民都能公平获得机会,对各国实现共同富裕而言均不可或缺。

(一)面向共享繁荣的经济规则重构

Tahir(2018)指出,如果游戏规则对所有经济主体都公平,规则就是公平的;如果规则只有利于某一部分群体,不改变规则是极不公平的。Stiglitz在《改写美国经济规则:增长与共享繁荣议程》(2015)一书中提出了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可持续增长和共享繁荣的规则。他指出,美国在不平等和经济流动性方面显露弊端,停滞不前的工资,直线上涨的医疗、住房和教育成本,以及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使大多数美国人的生存环境变坏,1/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但这并非是增长与平等必然冲突的产物,也不是市场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由那些颇具误导性的结构性规则造成的,比如取消了工人保护和家庭支持制度,建立奖励短期收益而非长期投资的税收制度,为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提供公共安全网,选择了促进财富积累而非充分就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他还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共享繁荣不能停留于再分配,而是要从源头上对规则秩序做出结构性变革,从而抑制不平等,以此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为大多数人增加工资、福利和经济政治权利。为此,必须重构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即恢复市场竞争、修复金融业、重新平衡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拓宽劳动市场就业途径及晋升空间,增加工人权力、经济安全和机会,限制财富不断流向富有的1%,为中产阶级找回安全感和发展机遇。

欧洲也面临挑战,缓慢的经济增长、普遍的收入停滞引发一系列政治经济后果,对公民的社会保护被削减了,边缘化人口成了“替罪羊”。Stiglitz et al(2020)将欧洲问题归源于市场崇拜,认为欧洲恢复经济活力、实现共享繁荣亟须制定一个有助于增长与共享的经济框架,即更新发展战略、重振欧洲一体化,调整宏微观运行和国际贸易规则,让欧洲央行承担政治责任,增加政府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结构转型,提高税收累进性,加强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优化竞争政策和社会政策。这些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规则重构构成未来共享繁荣的底层逻辑。

(二)发挥国家财政与援助的功能和力量

国家财政和外部援助从再分配和社会帮扶意义上为欠发达地区增长和脆弱群体增收提供了基础支持,对共享繁荣产生积极影响。国家财政可对底层40%人口实施就业、税收、社会保障以及福利政策倾斜,缩小初次分配差距,保障和支持中低收入群体发展。援助通过投资援建、贸易支持、物资捐赠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实现赶超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使之融入现代社会发展、共享文明成果。

一方面,财政作为国民收入分配调节的基本力量要引导公共资源向贫困群体适度倾斜,促进共享繁荣(Cord et al, 2015)。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利用财政支出补贴和激励贫困群体、加强社会保障、创造公益岗位、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是财政支持共享繁荣的重要体现(Bussolo & Lopez-Calva, 2014)。World Bank(2016, 2018)指出,国家财政可通过税收调节推动区域平衡,促进包容性增长;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更为有效。Lustig et al(2012)研究21世纪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减贫实践发现,政府转移支付对非劳动

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能够抵消其他非劳动收入来源的不平衡效应,在推进共享繁荣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指出,尽管部分家庭从国家就业激励政策中获利,但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难以享受这种福利政策(Reeves et al, 2015)。因此,制定财政激励政策应兼顾公平性和包容性。世界银行提出,应对疫情冲击及其长远影响,亟须政府优化财政政策,保护脆弱家庭,支持经济增长。第一个关键事项是将对家庭的低效补贴转向直接转移支付;第二个重点事项是发挥累进税功能并提高税收效率(World Bank, 2022)。Ofori et al(2022)研究表明,基于财政的社会公平政策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需要发挥作用,财政深化和政府生产性支出越大,这种作用越显著。

另一方面,横向意义上的国际或区际援助在推动跨国跨区域共享繁荣方面具有独特而显著的功能。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援地包容性增长、渐进式减贫和收入平等,对落后区域和弱势群体给予更多支持,助益跨区域共享繁荣的实现。Mawdsley et al(2018)指出,有效的援助应以发展驱动为主,综合考虑贸易、投资、移民、环境和发展融资之间的协调配置。长期以来,全球跨国援助以南北援助为主,但在北方经济体面临衰退时,一些学者对大规模向南支援的意义和成效表达了质疑。Tomlinson(2014)发现,援助从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一些亟须改进的问题,比如援助被明确用于“国家”自身利益,更多地发挥着刺激出口的作用,增长更多惠及的是民营部门和企业精英而不是贫困群体,导致不平等加剧,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投资的益贫导向以及降低金融风险的需求,造成援助在促进包容性增长、为底层40%人口提供机遇方面的作用失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收回援助”(withdrawal of aid)的建议(Mawdsley et al, 2018),以减少援助国对外投资的沉没成本。

(三)制定好的战略与政策

推进共享繁荣是系统工程,离不开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各国都在探索制定共享繁荣的长期战略,致力于推动增长与共享耦合,确保各阶层享有平等参与经济建设并从中获益的权利。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工作组建议重视可持续的增长,并将增长成果用于投资人类发展,保障弱势群体(Cruz et al, 2015)。Sondergaard et al(2016)基于国家系统诊断法(SCD)探讨了泰国推进生产力发展和共享繁荣的战略途径:一是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二是向底层40%提供更多支持;三是推动增长更加绿色、富有弹性。为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将改善劳动力教育和技能作为优先事项,出台旨在减少不平等、保障基本权益、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政策及项目。Berube et al(2018)提出政策制定的三个关键原则:一是支持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二是打造包容性劳动市场,保障弱势群体就业机会;三是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民生活质量。

以包容性政策促进增长与共享。面向共享繁荣的国家政策目标是促进经济稳步增长,提高效率和公平性,调整经济周期和结构,应对经济风险和挑战(Greene et al, 2020)。可通过财政、货币、产业、贸易、投资和创新等领域的政策优化,完善公共设施和服务,激励创新创业活动,促进就业率和收入提升,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政策支持,建立以低收入群体为客户或供应商的包容性商业模式,为贫困群体定制可负担的商品和服务,创造市场需求与就业机会,提高底层群体成果分享水平(Gaertner & Ishikawa, 2014)。经济政策除了增加就业与收入,还需考虑帮扶对象利益诉求优先项及其地域和群体差异,通过协商和参与的方式解决区域及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为民营部门创造良性包容的发展环境;重视边缘市场的资本流动和贸易,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增加中小企业合作和投资机会;为女性提供平等参与经济建设的机会,缩小就业机会和收入的性别差距,确保增长成果惠及女性群体(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4)。政府部门应加强监管、提升市场透明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腐败和不公平现象,提高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包容性(Perry, 2021)。

(四)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1. 提升各阶层的健康和教育水平。维持健康和加强教育是缩小就业不平等的关键,亦是共享繁荣的长效保障。一方面,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供普惠性医疗产品及服务,普及健康保健与疾病防治知识,使得各个阶层的居民提升健康质量,拥有参与经济建设并分享成果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教育和技能培训推动人力资本提升和生产效率提高,促进就业和包容性增长。政府应

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教育平等,为扩大就业和共享繁荣奠定人力资本基础(Berger & Fisher, 2013)。世界银行发布《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学习以实现教育的承诺》指出,教育是促进共享繁荣的有力工具,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向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面临“学习危机”,那些处于贫穷或社会边缘的人群在学习中未真正掌握现代社会技能,学习危机转化为技能缺失,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于这些国家共享繁荣的要求。报告提出了三个应对战略:对学习进行评估;让学校更好地为学习者服务;协调各方让教育系统更好发挥作用,向帮扶地区提供数字化教育资源,推进适应性教育方法变革。一些国际机构倡议对全球劳动力进行教育升级和技能再培训,确保各层次劳动力适应岗位技能要求变化,提升就业包容性(Price Waterhouse Bacchuss, 2021)。

2. 发挥现代科技的正向力量。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科技发展是推进共享繁荣的强大引擎。一方面,科技革命驱动产业革命、经济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助益增长和繁荣,但离不开创新体制与人才支撑。Berube et al(2018)提出,应该加大科研和教育投入,培育高素质人才,建立健全创新驱动体制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改变技术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这场革命的特点是虚拟、物理、生物、认知技术与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力量相结合,其在创造大量新机会加速人力资本提升及价值释放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风险(Bashir et al, 2021)。针对科技带来的人力替代、垄断等挑战,Lakner et al(2014)认为亟须制定具有包容性、平衡性的科技规则与政策,考虑不同阶段目标的协调性,保障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和分享权。只要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与规则制定,加强对底层劳动者的技术培训,数字化智能化引领的科技革命将成为持续包容性增长的重大驱动力,助益共享繁荣实现。

3. 应对气候变化、冲突等挑战确保共享繁荣可持续。气候变化叠加冲突等挑战威胁脆弱地区和人口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模式变化前所未有,扭转不利局面亟须发展模式革命。世界银行在《2020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中提出一种互补双轨型应对策略(complementary two-track approach):在短期内应对紧急危机,中长期解决气候变化和冲突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走向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一方面,要通过税收调节“降碳减排”,加强多方监管,缓解极端天气导致的灾害,保障生存条件不受破坏(World Bank, 2020b)。另一方面,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成本,改善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增强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及生态恢复能力(World Bank, 2022)。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冲突视为人类发展最大障碍,主张国家在预防冲突、缓解脆弱性中起到主导作用,强调不断增进包容性投资,确保复原力(Mayar, 2018)。

4. 以开放合作推动全球共享繁荣进程。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多边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增进互利共赢(Kumar, 2021)。各国应坚持开放合作型的财政、货币、产业、贸易、投资和創新政策,扩大市场和贸易规模,鼓励技术交流,融入全球化以获得更高水平“繁荣”,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推动繁荣“共享”(World Bank, 2013a)。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综合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目标和利益需求,以包容协调的方式推进开放合作,应对和抑制资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和文化冲击等负面影响。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多样性,实现文化成果交流与共享。

(五)提升金融包容性

完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包容性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升中低收入群体金融可得性。金融机构要向更大比例的底层人口提供可负担的信贷等金融服务,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调整消费模式,投资人力资本开发,积累实物资产,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增长和共享繁荣。Gould et al(2016)认为,如果国家目标是促进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那么金融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将金融包容性作为政策目标。金融包容性不仅帮助企业和个人在正常时期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机会,而且通过改善应对机制或分散银行风险,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财务脆弱性,并在银行业危机期间保护中低收入群体。Coulibaly & Yogo(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面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增加银行分支机构、改善金融服务可以缓解失业和贫困,全球银行每增加1%的分支机构数量可减少1000万人的工作贫困。一国致力于推进共享繁荣应将金融包容性发展作为主要政策目标,通过强化金融服务普惠性和益贫性,使信贷等金融服务在底层40%人口群体间有效扩张,以支持中低收入人口参与经济活动,提升收

人与消费水平。考虑到“移动银行”的低成本特性,金融机构应积极向贫困群体普及手机银行服务,向低收入者提供可获得性更高的金融服务,形成更高水平的金融包容,直接助益共享繁荣的底层实现。

五、结语

共享繁荣致力于推进底层40%人口即中低收入或脆弱群体的收入增长,成为衡量国家进步和国民幸福的新标志(World Bank,2013a)。学界对共享繁荣的研究围绕共享繁荣的含义、衡量与影响因素、实现路径及政策展开。研究共享繁荣要构建一个可识别和评估中低收入或脆弱群体从增长中获利程度的标准,通常用收入或消费指标来衡量。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共享繁荣提供支撑和动能,前者强调经济增长和机会公平兼容;后者关注增长与共享的可持续性,保证共享繁荣的稳步推进。各国通往共享繁荣之路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合理的规则、制度以及适宜的战略、政策。

本文对共享繁荣研究进展的梳理与考察可为我国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首先,共享繁荣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可识别中低收入群体从增长中获利程度的范式与标准,它强调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而非存量财富再分配,这为共同富裕理论建构、目标及着力点选择提供了国际参照。其次,共享繁荣评估依赖于“区域—家庭”收支追踪调查系统,其度量标准及监测方法可为共同富裕统计监测提供参考。再次,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共享繁荣的基础,也应成为共同富裕支撑因素与实现路径研究的基本考量。一方面,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关键是创造高质量的、包容性的就业机会,以及高标准、普惠性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并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获得助力。要发挥好财政及援助在成果共享中的再配置功能,增强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的普惠性,提升金融包容性,处理好新科技对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另一方面,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审视共同富裕的稳步实现,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防范多重风险冲击,夯实持续推进共同富裕的秩序基础和安全前提。

参考文献:

- Ahmed, M. (2013), “Toward prosperity for all Middle East. Focus on the futur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50(1): 8—13.
- Ali, I. & H. H. Son(2007), “Measuring inclusive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24(1):11—31.
- Alkire, S. & J. Foster(2011),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7—8):476—487.
- Alyakoob, M. & M. S. Rahman(2022), “Shared prosperity (or lack thereof) in the sharing econom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3(2):638—658.
- Antoine, K. et al(2017),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Let’s move the discussion beyond growth”, *Forum for Social Economics* 46(2):1—14.
- Appleton, S. et al(2014), “Understanding urban wage inequality in China 1988—2008: Evidence from quantile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62:1—13.
- Autor, D. H. (2015),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3—30.
- Bacchus, J. (2018), *The Willing World: Shaping and Sharing A Sustainable Global Prospe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istreri, E. J. et al(2016),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implications of deep integr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66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ssanini, A. & S. Scarpetta(2013), “The driving forces of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evidence for the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28(76):223—266.
- Basu, K. (2000), “On the goals of development”, in: G. M. Meier & J. E. Stiglitz(ed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su, K. (2006),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What can be done?”, *World Development* 34(8):1361—1373.
- Basu, K. (2013), *Shared Prosperity and the Mitigation of Poverty: In Practice and in Precep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shir, S. et al(2021), *The Converging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Human Capita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eegle, K. et al(2012), “Methods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through surveys: Experimental results from Tanzan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8(1):3–18.
- Berg, A. & J. D. Ostry(2011),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Finance & Development* 48(3):12–15.
- Berger, N. & P. Fisher(2013), “A well-educated workforce is key to state prosperity”,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2(1):1–14.
- Berube, A. et al(2018), “Building shared prosperity in America’s cities”, <https://www.sharedprosperitypartnership.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ACP1039-SP2-Framing-Paper-Final.pdf>.
- Bussolo, M. & L. F. Lopez-Calva(2014), *Shared Prosperity: Paving the Way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arletto, C. et al(2013), “Fact or artifact: The impact of measurement errors on th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3:254–261.
- Chenery, H. et al(1974),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Policie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ong, T. S. et al(2021), “The impacts of globalization on inequality in the post-COVID-19 world: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790312.
- Cord, L. et al(2015), *Shared Prosperity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oulibaly, A. & U. T. Yogo(2020), “The path to shared prosperity: Leveraging financial services outreach to create decent jo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87:131–147.
- Crivelli, E. et al(2010),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OECD Area: What are the Channels of Impact?* Paris: OECD Publishing.
- Cruz, M. et al(2015),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nd sharing prosperity: Progress and policies”, Policy Research Notes (PRNs) 10174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Souza, A. & D. Jolliffe(2012), “Rising food pric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Household-level evidence from Afghan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2):282–299.
- Dang, H. A. H. & P. F. Lanjouw(2015), “Toward a new definition of shared prosperity: A dynamic perspective from three countries”, in: K. Basu & J. E. Stiglitz(eds), *Inequality and Growth: Patterns and Policy*, Vol. I: *Concepts and Analy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Deaton, A. (1997), *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eaton, A. & V. Kozel(2005), “Data and dogma: The great Indian poverty debat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2):177–199.
- Deaton, A. & S. Zaidi(2002), “Guidelines for constructing consumption aggregates for welfare analysis”, World Bank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Working Paper, No. 135.
- DeNavas-Walt, C. et al(2013),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U. S. 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60–245,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4),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shared prosperity and poverty reduction: A strategic framework”, UK Government Paper,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conomic-development-for-shared-prosperity-and-poverty-reduction-a-strategic-framework>.
- Dollar, D. et al(2013), “Growth still is good for the po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56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 Engels, D. (2017),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A proxy for equitable development and shared prosperity”, *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 11(4):e0005419.
- Essama-Nssah, B. & P. J. Lambert(2009), “Measuring pro-pooriness: A unifying approach with new resul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5(3):752–778.
- Ferreira, F. H. G. et al(2014),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915.

- Fiedler, J. L. et al(2013), "Still waiting for Godot? Improving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expenditures surveys (HCES) to enable more evidence-based nutrition policies", *Food and Nutrition Bulletin* 33(3):S242—S251.
- Fox, S. & Y. M. Mubarak(2017), "Moveable social manufacturing: Making for shared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fragile regions", *Technology in Society* 51:1—7.
- Fuchs, V. (1967), "Redefining poverty and redistributing income", *Public Interest* 14(8): 88—95.
- Gaertner, K. & E. Ishikawa(2014), *Shared Prosperity through Inclusive Business: How Successful Companies Reach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Goldberg, P. K. & N. Pavcnik(2007),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39—82.
- Gould, D. M. et al(2016), "Finance,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Beyond credit deepening",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38(4):737—758.
- Greene, S. et al(2020), *State Policies to Promote Shared Prosperity in Citi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aseeb, M. et al(2020), "Nexus between globalizati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n economy: Evidence from application of partial and multiple wavelet coherenc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7(3): 723—745.
- Hargreaves, A. (2021), "Austerity and inequality; or prosperity for all? Educational policy directions beyond the pandemic",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20:3—10.
- Jolliffe, D. et al(2004), "Robust poverty and inequality measurement in Egypt: Correcting for spatial-price variation and sample design effect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 557—572.
- Jolliffe, D. (2006), "Poverty, prices, and place: How sensitive i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to 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s?", *Economic Inquiry* 44 (2):296—310.
- Kakwani, N. C. & E. M. Pernia(2000), "What is propoor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18(1):1—16.
- Kennedy, T. et al(2017), "Reducing gender wage inequality increases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all: Insights from Australia",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55:14—24.
- Khandker, S. R. & W. Mahmud(2012), *Seasonal Hunger and Public Policies: Evidence from Northwest Banglades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Kilic, T. et al(2017), "Costing household surveys for monitoring progress toward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nd boosting shared prosperi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951.
- Klinova, K. & A. Korinek(2021), "AI and shared prosper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1 AAAI/ACM Conference on AI, Ethics, and Society* (AIES'21),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645—651.
- Klugman, J. et al(2014), *Voice and Agency: Empowering Women and Girls for Shared Prosper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Kozmetsky, G. (1997),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emerging tr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IC²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WP—1997—10—01.
- Kozmetsky, G. et al(2003), *New Wealth: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Kumar, K. B. (2021), *Shared Prosperity: The Crying Need for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RAND.
- Lakner, C. & B. Milanovic(2016),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0(2):203—232.
- Lakner, C. et al(2014), "Twinning the goals: How can promoting shared prosperity help to reduce global povert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106.
- Lee, C. C. et al(2020), "Income in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country risk: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conomy* 26(2):379—404.
- Lustig, N. et al(2012), "Declin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2000s: The cases of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World development* 44:129—141.
- Mariotti, C. et al(2018), *Closing the Divide in Malawi: How to Reduce Inequality and Increase Prosperity for All*, Oxfam.

- Marshall, R. (2012), "Can we restore broadly shared prosperity?", *Work and Occupations* 39(4):376—387.
- Mawdsley, E. et al(2018), "Exporting stimulus and 'shared prosperity': Reinventing foreign aid for a retroliberal er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36:25—43.
- Mayar, H. U. R. (2018), "Sustaining pea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The question of fragile states", *Global Social Policy* 18(2):222—227.
- McLeod, R. H. (2014), "The sum is greater than the parts: Doubling shared prosperity in Indonesia through local and global integration",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8(2):104—105.
- Milanovic, B. (2016),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olina, E. et al(2015), "Outcomes, opportunity and development: Why unequal opportunities and not outcomes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735.
- Narayan, A. et al(2013), *Shared Prosperity: Links to Growth, Inequality and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Nyo, M. K. (2015), "ASEAN Community 2015 managing integration for better jobs and shared prosperity in Myanma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s, No. 994872743402676.
- Ofori, I. K. et al(2022), "Towards shared prosper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How does the effe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compare to social equity policies?",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34(1):97—113.
- Othman, M. B. (2015), "Role of women in achieving shared prosperity: An impact study of Islamic microfinance in Malaysia",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11:1043—1048.
- Palma, J. G. (2011), "Homogeneous middles vs. heterogeneous tails, and the end of the 'inverted-U': It's all about the share of the ric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1):87—153.
- Perry, J. (2021), *Trus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Secur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 Phillips, F. (2005), "Toward an intellectual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shared prosperity'",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18(6):547—568.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rice Waterhouse Bacchuss(2021), *Upskilling for Shared Prosperity*,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Switzerland.
- Ravallion, M. & S. Chen(2011), "Weakly relative povert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3(4):1251—1261.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eeves, R. V. et al(2015), "In a land of dollars: Deep poverty and its consequences", Social Mobility Papers,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 Roemer, J. E. (1998),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emer, J. E. & A. Trannoy(2015),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Theory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4(4):1288—1332.
- Rosenblatt, D. & T. J. McGavock(2013), "A note on the simple algebra of the shared prosperity indicato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664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Sen, 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glitz, J. E. et al(2009),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Paris.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 Stiglitz, J. E. (2015),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 Agenda for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WW Norton & Company.
- Stigiliz, J. E. et al(2020),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An Agenda for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WW Norton & Company.
- Subramanian, S. (2011),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the quintile income statist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6(4):69—72.
- Sondergaard, L. M. et al(2016), *Thailand-Systematic Country Diagnostic: Getting Back on Track-Reviving Growth and Securing Prosperity for All*,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Tahir, M. N. (2018), "Book Review: Joseph E. Stiglitz, *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 Agenda*

- for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Turkish Economic Review* 5(2):226—229.
- Tambo, E. et al(2019),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orporating public health measures towar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nd shared prosperity”, *Global Health Journal* 3(2):46—49.
- Tomlinson, B. (2014), “Fit for purpose: ODA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in: B. Tomlinson(ed), *Rethinking Partnerships in a Post—2015 World, Towards Equitabl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ality of Aid Network.
- Whalen, C. J. (1997), “Money-manager capitalism and the end of shared prospe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1(2):517—525.
- World Bank(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2011),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3a), *Shared Prosperity: A New Goal for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3b), *Shifting Gears to Accelerate Shared Prosper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4), *Prosperity for All: Ending Extreme Poverty: A Note for the World Bank Group Spring Meeting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5), *A Measured Approach to Ending Poverty and Boosting Shared Prosperity: Concepts, Data, and the Twin Goal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6),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7),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18),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8: Piecing Together the Poverty Puzzl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20a), *The Global Database of Shared Prosper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20b),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2022),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2: Correcting Cour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Research Progress on Shared Prosperity

HE Lilong CAO Zixuan LI Wenxi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Shared prosperity refers to the equal opportunity for the poorest 40% of the population in each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Shared prosperity is not about redistributing existing wealth, but about the growing and sharing of wealth. It is not confined to eliminating absolute or relative poverty, but ai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economic status of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Research on shared prosperit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tandard that can identify the degree to which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or vulnerable groups benefit from growth, which is generally measured by income or consumption indicators. Inclusive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 support and momentum for shared prosperity.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compati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fair opportunities, manifested as faster income and consumption growth for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groups or vulnerable group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 and sharing, emphasizing the stable advancement of shared prosperity by addressing multiple risk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and conflict. The paths to shared prosperity var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but all require reasonable rules, institutions, and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shared prosperity,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Keywords: Shared Prosperity; Inclusive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刘洪愧)

(校对:李仁贵)